



史學叢書系列 52

李龍潛著

明清經濟探微初編

暨南大学图书馆惠存：

明清經濟探微初編

李龍潛◎著

李龍潛敬贈
二〇〇二年九月廿四日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明清經濟探微初編 / 李龍潛著. --初版.

-- 臺北縣板橋市：稻鄉，民 91

面：21 公分

ISBN：986-7862-05-8（平裝）

1. 經濟－中國－明（1368-1644） 2. 經濟－
中國－清（1644-1912）

552.296

91010577

明清經濟探微初編

著 者：李龍潛

發行人：吳秀美

出 版：稻鄉出版社

臺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

電話：(02) 22566844、22514894

傳真：(02) 22564690

郵撥帳號：1204048-1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印 刷：吉豐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 600 元

初 版：中華民國 91 年 7 月

I S B N：986-7862-05-8

※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我和明清經濟史研究

——代自序

我 1931 年 2 月出生，廣東化州市人。1942 至 1950 年在家鄉讀小學和中學。記得 1949 年家鄉解放，我在化州一中讀高中三年級，教我們的語文老師是周鋼寰先生。他是個進步的語文教師（原為湛江市五中的特級教師，已退休），做過新聞記者，發表過不少文章。他對語文教學很有經驗，講課十分生動，引人入勝。他講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一課時，爲了說明文學作品審美觀的階級性，說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審美觀，如描寫美女，在封建地主階級騷人墨客筆下，是千篇一律的「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而在無產階級作家趙樹理筆下，是「小芹走到哪裡，小伙子的眼睛轉到哪裏」，表現了小芹引人的年輕美麗。由於他的引導，使我對文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再加上我有一些古典文學的基礎，許多名篇佳作，童年時在家塾讀過，具有讀文科的條件。所以 1950 年我十九歲高中畢業後，就毅然選擇了報考大學文學院。

1950 年 7 月，我考入了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只讀了一個學期，因

經濟來源困難，便停學到博羅中學任教。在教中學期間，我擔任初中兩個班的語文和歷史課程。正如《禮記》所說：「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我必須採取邊教邊學的辦法，去完成教學任務。自學文史知識，如飢如渴地閱讀《語文學習》、《語文教學》和《歷史教學》等雜誌。爲了幫助同學學習，我編寫了一本《標點符號講話》的小冊子，油印發給他們。節假日，我根據《史記》、《漢書》和翦伯贊的《中國史綱》，撰寫《陳涉傳》、《劉邦、項羽本紀》等習作。這對我鞏固文史知識和提高寫作能力有很大幫助。

我教了兩年中學，至 1953 年廣州高校設有幹部學習助學金，規定只要工作兩年便可領取。我符合條件，這年便復學，回到院系調整後的中山大學歷史系讀書。系裏名教授很多，如陳寅恪、岑仲勉、劉節、梁方仲、陳序經等等，都是學貫中西，各有專長的大學問家。我在他們的教育和影響下，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稍知做學問的艱辛。

1955 年我讀歷史系三年級時，正是科學的春天，黨號召知識分子向科學進軍。爲了響應黨的號召，中大的教授們埋頭著書立說，主持各種學術講座；學生們也紛紛成立科研小組，開展科研活動。一瞬間，科學研究蔚然成風。在這種科研氣氛的影響下，我參加了由陳錫祺教授指導下的《近百年來廣東人民反抗帝國主義鬥爭》的學生科研小組，利用課餘時間，收集史料，定出專題，開展討論，撰述論文。當時，我和盧權等同學合作，由我執筆，撰述了《鴉片戰爭期間廣東三元里人民反抗英國侵略者的鬥爭》一文，發表在當年的《歷史教學》雜誌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學術論文，雖是資料整理，但卻勾勒出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的簡要過程，給我鼓勵很大。從此，我暗下決心：將來從事歷史學的研究工作。

1956 年 7 月我在中山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分配工作時，山東大學

需要一名助教。當時研究農民戰爭史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門課題，我便想去山大跟趙儷生教授研究中國農民戰爭史，向組織提出要求，但因我是廣東人，不是外省人，講普通話不流暢，所以最後組織上決定由河南籍的鄭佩欽同學去山大，我留校當進修生兼助教（當時，中大未招研究生，只有進修生制度），跟梁方仲教授學習明清經濟史。

我的大學畢業論文《明代礦業的發展》，就是由梁方仲教授指導的。我知道梁教授是我國著名的中國經濟史專家，特別是明清經濟史方面有顯著的成就。在中外學術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和聲譽。早在 30 年代，就被日本學者稱為中國「少壯學者」。以後每有新作問世，都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和好評。他與人相處，十分厚道，對學生更是愛護備至。在學習上，他怕年輕人在成績面前驕傲自滿，當面常批評不表揚，背後常表揚不批評。因此，我們都樂意聽取他批評的意見。有這樣的好老師，應該說我有幸了。雖然未能如願去山大，卻也願意留校跟梁方仲教授學習明清經濟史。

當時跟梁方仲教授一起學習的，還有從雲南大學歷史系畢業後派來廣東社會科學院工作的張維熊，以及從上海調回中大當梁方仲教授的專家助手湯明燧，還有兩位專門替梁先生抄寫的職員。梁先生規定我們的學習和工作範圍。湯明燧同志要協助梁先生編撰《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一書，我和張維熊注釋《明史·食貨志》，先做核對工作，即把《明史·食貨志》和《明史稿·食貨志》、王原《明食貨志》、《明書·賦役志》等互相核對，把不同字句列出，然後環繞《明史·食貨志》中的大小問題，廣泛讀書，認真研究，考其源流，究其奧秘，訂其訛誤，並做札記，最後才逐句加以注釋。一句話，就是在研究基礎上做注釋，注釋中反映自己的研究水平，不是為注釋而注釋，不是單純的做字面上的注釋功夫。這樣做，不僅可以把基礎打好，掌握整個明代經濟史的基

本知識，掌握明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全局，而且在這個基礎上，開始進行專題研究，便可綜觀全局，開闊視野，洞察竅要，見微知著，寫出文章，才有所成就。可惜，由於當時各種運動衝擊過多，我們沒有時間，來不及按照他的辦法完成學習任務，至今尚是一件憾事。

與此同時，梁先生還配合當前學術界的研究中心，指導我們開展專題研究。當時，學術界熱烈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1956年第10期《歷史研究》發表了鄧拓同志的《從萬曆到乾隆——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一個論證》一文，梁先生便從此入手，規定我們每星期五下午到他家去學習討論鄧文，聽取我們的學習心得和體會，並啓發我們研究問題。從1956年10月開始，至1957年秋末，爲時前後約一年，我們在梁先生的指導和啓發下，便撰寫了《對鄧拓同志〈從萬曆到乾隆〉一文的商榷與補充》一文，發表在1958年第1期《歷史研究》上。爲了研究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梁先生還帶領我們認真鑽研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謂原始累積》，要求我們對其中有關封建社會瓦解過程，所謂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萌芽典型論述，徹底弄清其理論範疇、概念、術語的真正涵義，領會其精神實質，以便借此指導明清經濟史研究，盡力避免生搬硬套的毛病。爲了指導我們的學習，他還根據德文原版本、英文譯本擇要翻譯了《所謂原始積累》這一章，並給予詳盡的解說。在《所謂原始積累》這一章中，原郭大力、王亞南的中譯本有一段標題是《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的產生》，他改譯爲《資本主義租地農業家的來源》，爲什麼要這樣改呢？根據我的體會，他認爲「積累是先於資本主義積累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存在的。原始積累不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對工人實行剝削的結果，但它對資本主義剝削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因而造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積累得以進行的條件。從這個意義說來，原始積累過程與資本主義萌芽過程大體上是一致的」

（見《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補編》第 250 頁，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爲了區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時期的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和原始積累時期資本主義租地農業家，故有是改。其他改動，有的原譯文中費解的，如原中譯文：「在英國，最初形式的租地農場主本身也是農奴的管事」。他改譯爲：「在英國，出身於農奴的管事，就是農業家的最早類型。」有的原譯中文不達原意的，如第三版英譯本「The Farmer Proper」，中譯文爲「真正的租地農業家」，似未達原意，他改譯爲「道地的租地農業家」，較勝一籌。總之，經過他細緻的研究和改譯以後，不僅使我們容易理解和體會原著的涵義，領會其精神實質，而且使我們了解英國在農業中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租地農業家的來源，經過「管事」、「小農場經營者」、「半租地農業家」和「道地的租地農業家」的複雜的發展過程。這對我們運用歷史比較法去研究我國農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就具有相當重要的指導意義。他這種下苦功鑽研馬克思主義原著的精神和嚴謹求實的學風，同樣貫穿在搜集和運用史料方面。他常對我們說，「要做到真正掌握史料，搜羅材料固然需要費很大的功夫，而對歷史記載真偽的甄審，對歷史典章制度的考釋，以及材料本身含意所允許引申的限度，都需要認真講求。只有這樣，才不致濫引証據，斷章取義，或以主觀臆想戴在歷史實際的頭上」（見拙著《明清經濟史》扉頁，湯明燧：《辛勤耕耘的碩果——序《明清經濟史》一文）。他這種刻苦鑽研馬克思主義原著的精神和嚴謹的求實學風，以及他主張闡幽發微的創造精神，重視計量經濟學和歷史比較法，都對我後來從事明清經濟史研究影響很大。

在跟梁方仲教授學習期間，我開始認識到研究明清經濟史的重要性。由於明清時代處於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它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起著承上啓下的作用，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中國近代史和明清經濟史

的關係十分密切。中國近代史上的許多問題，都可以從明清經濟史得到解釋的。如果不了解明清經濟史，中國近代史上的許多問題，就不能理解，或理解不深。這正如著名史學家范文瀾同志指出：「中國長期封建社會到明朝已進入後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萌芽了，到了清朝（鴉片戰爭以前）有進一步發展。不了解明清兩朝經濟發展的實情，要了解中國一接觸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便有各種反應的原因是困難的。因為以林則徐等為代表的改良主義傾向；太平天國農民戰爭之所以成為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曾國藩、李鴻章等軍閥官僚為什麼辦洋務，廣東上海紳商首先仿制外洋器物等事實，都有它們的經濟原因，都不是偶然的。」（《關於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載《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一集，中國科學院 1954 年出版）因此，學習和研究明清經濟史，就能幫助我們理解中國近代史，幫助我們認識中國為什麼不走上資本主義而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道路，幫助我們理解和掌握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是很有意義的。同時，還探討了明清經濟史的研究對象，認識到明清經濟史是斷代史，屬於社會科學範疇，又是介於歷史學和經濟學之間的一門邊緣科學。它的研究對象，即通過具體的史實，研究明清時期人民群眾發展生產的鬥爭過程，研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和統一的辨證發展過程，研究生產、交換和分配等具體經濟狀況，從而闡明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經濟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因為有了這些基本認識，使我堅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立志終身研究明清經濟史，從而走上了研究明清經濟史的道路。

二

1957年冬天，正當我照梁方仲教授安排的《明史·食貨志》注釋的學習計劃，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重點地翻閱明人文集、筆記及地方志的時候，我不幸患了初期肺病，被迫休息，組織上安排我去廣州白鶴洞廣州市教工療養所療養。爲了迅速恢復健康，在醫生指導下，我堅持早上練功，下午在空曠之地臥帆布床，利用室外空氣治療。這樣，我前後休養了半年之久，至1958年6月，病癒返校。時逢「大躍進」，廣東全省成立多間高等專科師範學校，急需教師，我便被調至海南師專文史科任教。從1958年10月至1966年6月，我離開了廣州中山大學和留戀的圖書館，到一間剛開辦的偏僻的海南師專去工作，教學和科研都會遇到不少困難，特別是科研，學校圖書缺乏，只有從前海南大學留下的二十四史、明版王圻《續文南通考》殘本，以及其他一些叢書殘本等，要做明清經濟史研究是相當困難的。爲了克服科研上的困難，我利用寒暑假或公幹來廣州的機會，一面去拜訪梁方仲先生，爭取他的指導和替我審閱文稿；另一方面就去廣州中山圖書館和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學院圖書館讀書。其中去中山圖書館古籍文獻部最多，許多年的寒暑假都是在那裏度過。中山圖書館古籍文獻部藏有許多珍本秘籍，是廣東最大的古籍文獻中心。該館的館規極嚴，罕見的圖書，一般人難得一見，借出館外就更難。我因是外地讀者有介紹信沒有借書証，只能在館內瀏覽一般圖書。記得有一年暑假，風雨交加之日，偌大的文獻部，座位空無一人，只有我冒著風雨照常來閱讀，感動了負責借書黃小姐，和我交談，了解我從幾百里外來館讀書，非常不容易，知道我讀書是爲了研究明清經濟史，從而同情我，讓我看了許多名本佳槧，並允許我借出普通古籍文獻，使我可以利用晚上時間繼續閱讀。這一年暑假，我非常幸運

地在該館查閱了數十種明版書籍，如明張瀚輯《皇明疏義輯略》三十七卷，嘉靖元年刊本；明馮琦輯《經濟類編》一百卷，萬曆甲辰刻本；明王僞撰《虛舟集》五卷，藍格鈔本；明陸容撰《式齋文集》三十七卷附錄四卷，鈔本等，寫了每冊三百多頁的筆記，共二冊，是研究明清經濟史極珍貴的史料。可惜，只利用了一些，其他來不及利用，在文化大革命中遺失了。現在想來，十分可惜！

海南師專是一所高等師範專科學校，主要是培養初中教師，對老師科研的要求，主要是教學研究，不似綜合性大學那樣有專業科研任務，因此，我只能在業餘時間研究明清經濟史。當時，從實際出發，我需要繼續打基礎，便依照上述梁方仲教授安排注釋《明史·食貨志》的辦法，稍作變通，有計劃有系統地閱讀《明史稿·食貨志》、王圻《續文獻通考》和傅為麟《明書》有關經濟部份等，又買了《國榷》，從頭到尾地讀了一次。另外，還閱讀了《清史稿·食貨志》，《乾隆續文獻通考》和《清朝文獻通考》有關經濟部分，並編寫明清社會經濟大事記，這樣，不僅使我對明清社會經濟有了進一步的比較全面的了解，對我後來撰寫《明清經濟史》一書也有很大的幫助。

在這期間，注重閱讀當代書刊，講求讀書方法，——主要是師承梁方仲教授的讀書方法，雖然他從來沒有和我們談過讀書方法一類的東西，因為在他看來，讀書方法，可能因人而異，各人有各人一套讀書方法。他凡讀別人的論著，遇有疑問點，不僅對材料出處，遍加校讎，並細查書名、卷數，著者姓名，確屬錯誤，必作更改。由於校讎材料，常常發現材料內容和引申的限度不一致，或材料內容和所得的結論不符合等，從而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然後再讀有關的書去解決。在他讀過的書中，畫上許多橫杠、直杠、圓點等紅、綠、黑色符號，如在一段文字的中心內容之處劃上短的橫杠，不似一些人那樣整段文字都畫上，那是

等於不畫一樣。這樣就突出了一段文字的內容中心，易於記憶。肯定之處，加上紅的圓點，提醒注意；錯誤之處，加上長橫杠，再在旁邊加上直杠，然後寫上錯誤原因。這種讀書方法，正如梁啟超所說，不會讀書的人，看到書上的文字，都是平的；會讀書的人，看到書上的文字，有的是凸出的。據我的體會，所謂「凸」出的，似仲師那樣會讀書的人，就能夠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他這套讀書方法，我基本上承襲下來，對研究工作真是一生受益匪淺。同時，就是寫讀書筆記，其內容：一則書的版本、館藏編號和作者行狀。二則重要的罕見的類書，抄錄其中有關明清經濟的目錄，如馮琦編纂《經濟類編》第三十五卷，財賦類一，理財一；第三十六卷，財賦類二，理財二；第三十七卷，財賦類三，勸農、賦役；第三十八卷，財賦類四，積貯、救荒、漕運、貨殖；第六十二卷，武功類八，屯田、馬政。以上兩則內容，為便於重看和研究提供線索。三則史料抄錄，或詳或略，視乎重要程度和需要決定。它是筆記的重要組成部分。史料抄錄多了常遇到一件事有幾種記載，便立刻注明又見於筆記某頁，研究時，可以互相印証、校勘，常發現問題。四則在史料之後寫按語，如唐贊襄纂的《嘉善縣志》卷12，《鹽法2》條載：嘉善縣戶口食鹽鈔，「厥後鹽雖不給，而原額固在，有司因並其入秋糧帶征」。我按云：此材料很有價值，說明明初由官府直接抑配的出賣鹽的戶口食鹽鈔制度，到明中葉以後，便逐漸演變為向人民額外剝削的賦稅制度了。五則印象，讀完後總印象。如讀明王肯堂撰《郁岡筆塵》後，我寫的印象是：作者是個雜家，不僅精通文史哲，而且還是個醫生，書內藥方不少；同時，天文地理數學亦有較深的造詣，書內有關這方面材料不少，特別記述了利瑪竇有關天文曆法方面的材料和「格言」，頗值得研究。如利瑪竇提出的命題：「日體大於地，月體小於地，圓尖之體其底必大。」作者均有解釋，其中涉及幾何等科學知識，可惜

我不懂，無法研究。然研究西學東漸者，良有以也。我寫的讀書筆記，大部分是史料抄錄，故名曰「讀書小札」。每卷扉頁，抄有名人語錄，如第三十七卷，錄林則徐聯語：「事能知足心常樂，人到無求品自高。」第四十卷，抄錄齊白石語錄：「一息尚存書要讀。」聊作座右銘，警勵自己。我深深地感到寫讀書小札，不僅可以鍛煉寫作，研究思考和分析問題，而且可以幫助記憶，積累研究素材。要用時，一查每卷尾索引便知，取來運用自如。它比卡片易於保存，免至散失。從 60 年代至今，我每當讀業務書刊，必寫讀書小札，已成習慣，共寫了五十多本，除「文革」期間散失二本外，其餘大部分保存下來了。這些讀書小札成為我研究撰文的素材，為研究明清經濟史提供很大的便利。

隨著讀書增多，知識面擴大，積累的研究素材亦逐漸增多，於是選專題研究，便能水到渠成。幾年間，教學之餘，我撰了《明代屯田制度》、《明代庄田的發展和特點——兼論皇店、塌房、「店肆」等工商業的經營性質》、《明代礦業的發展與礦工運動》、《明代戶口食鹽鈔制度》、《明代鹽的開中制度與鹽商資本的發展》、《明正統年間廣東黃肖養起義》、《明天啓年間徐鴻儒起義》和舊作《明正統年間葉宗留、鄧茂七起義的經過及特點》等，共三十萬字左右，編成集子，定名為《讀明史札記》。1965 年初寄給北京三聯書店審查。三月後，初審同意出版，需做修訂工作，將原稿退回並寄來大型三聯稿紙數百張，囑早日謄清寄去。到 1966 年夏季剛把稿子修訂好並謄正待寄去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停止一切教學和科研工作，整日參加「鬥批改」，還下放農場養牛。自然，《讀明史札記》無法出版而流產了。

「文革」期間，我因兼任圖書館館長之職，是個單位小頭頭；又寫過介紹海瑞墨跡的小文章在報上發表，所以一開始便靠邊站，被編入「牛欄」勞動。而我平生沒有做過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給群眾印象較好，

沒有被抄家，也沒有在全校的場合鬥爭過，使我的書籍基本上保存下來。後來解放，被安排在後方備戰農場勞動。當時，在「讀書無用論」的衝擊下，我曾經一度對明清經濟史的研究發生動搖，所有業務書籍都裝箱束之高閣，沒有時間和需要閱讀。我只希望學習一些實用知識，作為謀生的技能，便跟物理科的老師學習無線電知識，修理和安裝收音機擴音機。不久，我想自己研究明清經濟史多年，放棄了未免可惜；同時，看到國家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仍存在，將來肯定還需要研究社會科學，於是我白天參加「鬥批改」或勞動，晚上在油燈下看報紙雜誌，了解學術界動向，希望和惦念著還有研究明清經濟史的機會。這樣，一晃就幾年，至 1972 年我終於從後方農場調返學校，安排在儒法鬥爭辦公室工作，參加儒法鬥爭，要求我注釋法家王夫之著作供大家學習。我便把書籍打開，取出王夫之著作及有關參考書籍，發現我從前謄正的準備交給三聯的《讀明史札記》遺失了。由於其中「庄田」及「礦業」兩文，曾經梁方仲教授親手修改的，所以我非常痛惜！幸好底稿尚保存著，才使我後來根據底稿重寫，分篇在各地刊物上發表了。

三

1973 年春，我到廣州參加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等單位主持的《龔自珍詩文選注》一書的修改工作，隨後被借調往省教育廳，參加編寫中學歷史課本，為時年多。至 1975 又被借調往省委宣傳部理論組，金應熙教授當組長，分配給我編寫《中國古代史》明清部分的任務。及至 1979 年，暨南大學復辦，工作需要，我便正式調到該校歷系工作，擔任明清經濟史的教學任務。從此，我便回到明清經濟史研究的道路上

了。

在我從事明清經濟史研究的過程中，曾經給予熱情的幫助和支持的，學術界有兩位長者：一是李光壁教授。他原任教於天津師範學院，後調石家庄河北大學任教，兼《歷史教學》編委。1958年他編輯《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給三聯書店出版，收入拙作《明正統年間葉宗留、鄧茂七起義的經過及特點》一文，因此，開始通訊，直至「文革」後他病逝，除「文革」期間基本音訊不斷。他寫信用鋼筆楷書，字體端莊秀麗。他對人厚道，敬仰梁方仲教授，如1973年得知梁方仲教授不幸逝世的消息，立刻來信表示惋惜、「懷念不已」之情，並囑我組織同仁替梁教授出論文集，嘉惠學林。對後學的我，更是愛護備至。在學術上，他替我潤色文稿，幫助發表；每有新作，常惠贈我，以資學習。我和他終生無緣見面，只從他給我一幀以中國歷史博館為背景的全身照片，一睹他魁梧的體態和風姿。他歷次給我的信，可惜都在「文革」中遺失了。現在止保存1973年他最後給我的一封信，作為永久的紀念。二是謝國楨教授。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員，著名的明清史專家、版本目錄學家。我因讀他的《晚明史籍考》和《明清筆記叢談》，而仰慕他，想成為他的私淑子弟。1961年我曾模仿他的《明清筆記叢談》的文體，撰了數則介紹幾種鈔本善本書的小文。為此，是年稍，我試探地寫了一封賀年信給他，沒想到他立刻給我回信並寄來一頁宣紙，上面影印毛主席的親筆字「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旁有紅色篆體「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印章，十分精美。我把他裝入湘竹鏡架，至今尚保存在我的書架當眼處。從此以後，我在研究上，遇到什麼困難，便向他請教。他是有問必答，不管問題大小。如1973年我們注釋魏源《海國圖志序》，其中有「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寇，先平人心之積患』」的語句。我們不了解這句話的來源，便由我寫信去北京請教他，

不久，便接到他從上海女兒家中給我的覆信，指出這句話「是明代通常用的一種語句，是出於明代王守仁《傳習錄》中所說的『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演變而出，至於這個明臣，可能是戚繼光、俞大猷之類，因手間無書，未能詳為答覆，為憾」。根據他的指引，我們很快地解決問題。記得有兩次通訊，他還給我寄來他寫的詩，其中一首是：「文章何堪與世爭，胸懷遼闊自崢嶸；不求秦宓虛譚論，俯首工農作老兵」，實在值得我們後輩學習。我把他抄入我 1987 年的《讀書小札》扉頁上，作為座右銘。我和他見面，是 1980 年在天津南開大學召開的國際明史研討會上。會後到北京，一天晚上，我又和鄭州大學王興亞教授到建外永安南里十樓 601 號他的寓所拜訪他。對我們來訪，他十分高興，熱情接待。在他的書齋裏，藏有很多罕見的珍本明清筆記，書架擺至室頂。當談至明清經濟史料學時，他就從高架上搬下來，展示給我們看，並作詳細的介紹。當晚的談話，實在是替我們上了一堂最好的明清經濟史料學課程，得益匪淺。他給我寫的信，大都是毛筆行書，字體圓潤清朗，溫文爾雅，具有晉人的風格。可惜大都已在「文革」中遺失，現在只存留了「文革」後給我的幾封信及給我寄贈的《明代社會經濟料選編》等書。他對我的教導和幫助，我終生不敢忘卻。

從 1979 年至今改革開放，經濟繁榮，文教昌盛，形勢大好。在這期間，我在暨大歷史系，被評為教授，出任中古史教研究室主任，承擔中古史碩士點建設和課題領頭任務，除教學和指導研究生外，積極開展明清經濟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績。已發表的專著有《明清經濟史》、整理標點明代廣東筆記《亂離聞見錄》（1983 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晚清廣東筆記《香港紀略》（1997 年暨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主編《14 世紀以來廣東社會經濟的發展》（1992 年廣東高教出版社出版），以及學術論文五十餘篇，總計約二百萬字。其中《明清經濟史》榮獲 1986-1988

年中南地區大學出版社優秀教材一等獎，1993 年國家教委第二屆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材優秀獎；論文《明代廣東三十六行考釋》，榮獲 1983 年廣東省優秀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三等獎。

《明清經濟史》是我上課的講稿。1980 年我開始擔任這門選修課，對象是歷史系本科三、四年級學生，也常有本校青年教師、研究生和校外進修教師來旁聽。當時，一年每周上課四節，沒有教材，能供學生參考的書籍也不多。爲了把教學和科研結合起來，在過去專題研究的基礎上，我花了兩年時間，編寫出《明清經濟史》，油印給學生參考。後來又經過幾次的講授和修改，於 1988 年交廣東高教出版社出版。《明清經濟史》共五章，四十三萬字，敘述明初至鴉片戰爭前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社會經濟史。是一部全面地系統論述明清的開拓性著作，填補了歷史研究的空白。書中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探討封建社會經濟規律，提供歷史借鑒，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同時，努力做到運用史料豐贍，敘事全面、詳盡，注意到材料取舍的典型性和系統性，立論建築在充足的史料基礎上，並提出個人的見解。此外，涉及主要的典章制度，考訂源流，觸類旁通，爭取爲後學樹立踏實嚴謹的學風。該書出版以後，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和重視。在國外，如香港（當時屬英殖民地）王曄寫的書評說：「《明清經濟史》是一部系統論述明清經濟的開拓性著作」（見 1990 年 2 月 12 日香港《大公報》）。日本京都大學夫馬進教授來信說：「這本書雖是『教材』，但亦不似一般的『通史』，所收集介紹的史料文獻很多，又很有意思，對於我們教學也有很多用處。」名古屋大學森正夫教授也來信說：是書「所論的範圍之廣，時代之長，令人欽佩。特別我們日本學者之中具有這麼長遠眼光的人很少，所以應該學習的地方肯定是很多」。馬來西亞作家劉子政也來信說：「是書有關商業外貿一章，或有關婆羅洲文萊與之交往貿易各項